

科学博物馆学的学术理路考察*

Rationale Scientific Museolog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王思怡

Wang Siyi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内容提要: 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有近60年的发展, 其中独树一帜的“科学博物馆学”思想为博物馆学的发展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土壤。从学术理念上, 斯坦斯基 (Zbyněk Z. Stránský) 的“博物馆物—博物馆性—博物馆化”、施莱纳 (Klaus Schreiner) 的“博物馆实物”概念和鲍尔 (Antun Bauer) 的“基于物的展示”是“科学博物馆学”实践的理论基础, 并促发了两种新博物馆模式: 革命博物馆和本土博物馆; 在内部延续性上, “科学博物馆学”在学院教育和国际组织学术传播上均产生长远影响。

关键词: 科学博物馆学 斯坦斯基 博物馆实物 基于物的展示

Abstract: Museology,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has been nearly six decades of development. The distinctive idea of Scientific Museology has provided a rich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is field. In terms of academic philosophy, Zbyněk Z. Stránský's "Musealia, Museality, Musealization", Klaus Schreiner's "Gegenstand" concept and Antun Bauer's "object-based displays" a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actice of Scientific Museology, laying the ideological groundwork for the emergence of two novel museums: the Revolutionary Museum and the Native Place Museum. Lastly, in terms of continuity, Scientific Museology has exerted a lasting influence on both academic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ies.

Key Words: Scientific Museology; Zbyněk Z. Stránský; Gegenstand; object-based displays

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科, 自1964年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开展教学以来, 已发展了近六十年。在这段时间里, 博物馆学学科不

断发展, 世界各地有数百个以博物馆学或博物馆研究命名的大学部门或教学项目, 与博物馆学相关的书籍、杂志和互联网信息输出量庞大。然而, 正如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博物馆民族志视角下的中国革命文化展览红色叙事研究”(项目编号: 20CMZ027) 阶段性成果。

捷克博物馆学家扬·多拉卡（Jan Dolák）最新出版的专著《博物馆学及其理论》（*Museology and Its Theory*）中指出的，整个学科正出现着某种程度的松懈^{[1]5}。因此，我们有必要审视其理论基础、所使用的术语和研究方法，研究博物馆学的发展方式和方向，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虽然在研究史上，我们常常会将博物馆学的研究分野为“博物馆学（*Museology*）”和“博物馆实务（*Museography*）”，在理论上也有新旧之分，或是地域特点之别。但实际上，*Museology*与*Museography*的一般问题极为相似，甚至可以说是相同^[1]。以往博物馆学的理论或实践研究，较多关注二者外在特点的不同，而忽略内在理路的梳理，注重现象的列举而研究范式解读不足。基于此，本文期望通过梳理“科学博物馆学”的发展历程，来解释今天我们所说的“博物馆学”是如何完成历史转型的，同时也进一步了解这一“学术转型”的背景和动力：是学术制度的变化，是机构实践的刺激，抑或是新方法的推动，还是政治形势和国际环境的作用？正如葛兆光所言，学术史研究的意义，既不是“怀旧”（批判现实），也不是“表彰”（见贤思齐），而在于知道“一代有一代的问题和方法”^[2]。当下的博物馆学思想是否受到“科学博物馆学”的影响，其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语境下有何继承和改变？更重要的是，“科学博物馆学”的发展进程为我们未来的博物馆学带来了哪些启发？什么才是博物馆学“可持续”的学术问题？本文将从“科学博物馆学”的学科意识、学术理念、研究实践及内在延续性^[3]四个方面来试图厘清其学术理路，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中国博物馆学的学术史建设提供参考。

一、学科意识：收藏行为和知识传播

在扬·多拉卡看来，博物馆学的学科意识属于前博物馆学思想的研究范畴^{[1]7}。在博物馆机构还未出现之前，前博物馆学的思想便伴随着两条脉络萌生与发展，其一是藏品和收藏行为发展的脉络，其二是知识发展的脉络。两者都具有历经数个世纪独

立而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最终汇聚在一起，形成如今我们所认知的博物馆学和博物馆。

1. 对收藏行为的记录与分类

收藏行为产生在博物馆诞生前。在西方，中世纪时，收藏行为得到长足发展，其特征是对基督教圣物的收藏，代表有圣德尼修道院的宝物收藏等，其将物品以特定方式和顺序进行展示的原则也影响了日后博物馆的发展；收藏目录也因此发展起来，为后来的编目行为奠定了基础。物的收藏成为中世纪基督教教堂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

到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收藏行为脱离宗教背景，日益世俗化；另一方面，学者们于16世纪发展出了“珍奇柜（*cabinet of curiosity*）”，并出现了对部分人群开放的安布拉斯城堡，以及最早的准博物馆收藏目录。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存在着将物品组织成一个系统的强烈需求，并为收藏制定规则的基础。这导致了第一批可被视为“原博物馆学（*protomuseology*）”的理论论文的出现。

2. 博物馆知识的传播

博物馆的词源希腊语“*museion*”，即“缪斯神庙”。缪斯是古希腊艺术灵感女神，经常被视作哲学灵感的来源。毕达哥拉斯学派发展出了约定在一个地方见面进行哲学讨论的传统，影响了诸多学派。到托勒密时代，建立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与之相伴的是一个知识大发展时代，这种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书籍的积累实现，图书馆成为学者和哲学家的聚集地。由此观之，博物馆的核心属性是“一个与哲学讨论密切相关的地方”^[4]，更加强调知识发展的层面，而非收藏的层面。

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重新发现，博物馆的核心原则也被重新发现。在整个中世纪被遗忘的“博物馆”概念重新出现，并通过学者的诠释而得以重生。在使用缪斯神庙这个词来命名博物馆的同时，一系列其他词语也被加入进来，如学者用来沉思写作的“学者工作室（*studiolo*）”以及陈列藏品的“别墅（*villa*）”，

但别墅的初衷依然是一个哲学思辨之地，且其建筑保留了穹顶的形制，说明博物馆和缪斯神殿的原意依然紧密联系。此时，陆续出现了第一份陈列室清单、第一本关于博物馆学的论著等。到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收藏的传统和学者的哲学思辨联系逐步密切，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珍奇柜”这一概念，并致力于促进科学知识的进步。其中蕴含的哲学思辨和知识传播与进步的理念构成了此后博物馆重要的一层本质。博物馆中的物品作为启发思想、帮助理解的知识载体身份延续至今，超越了其作为单纯的收藏、欣赏对象的意义。深入理解物品内部的知识、思想和情感，以启发智性的发展，这是博物馆的重要目的所在。因此，“知识发展”这一脉络的发展史便投射出以此为目的的博物馆学发展史。

二、“科学博物馆学”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因此，基于从收藏行为到知识发展的前博物馆学学科意识，“科学博物馆学”倾向于将博物馆学视为一门研究博物馆现象的科学^[5]，诸多学者极力呼吁，要发展一批系统性且适当的博物馆学术语^[6]。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布尔诺和萨格勒布的大学成为博物馆学学科的两大摇篮，在此形成了如今广泛认可的术语词汇^[7]。

其中，捷克博物馆学家维诺什·索夫卡（Vinoš Sofka）强调了建立理论博物学基础以应对博物馆环境变迁的重要性^[8]，同时其撰写的《博物馆学方法论和专业培训》（*Methodology of Museology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一文便提供了来自东欧博物馆学家的多种博物馆学观点^[9]。博物馆学可分为普通博物馆学、专门博物馆学或子类别，如博物馆系统、历史和哲学、社会科学、自然历史、应用博物馆学或博物馆实务和理论博物馆学等，并强调其跨学科性，如提出技术博物馆学的概念^[10]。

在20世纪下半叶，对博物馆理论方法的需求变得明显，这促成博物馆学系的建立并将博物馆学培养成一门科学，即“科学博物馆学”学派的诞生，

代表性人物有扬·耶利内克（Jan Jelínek）、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坦斯基（Zbyněk Zbyslav Stránský，又译为斯特兰斯基）、克劳斯·施莱纳（Klaus Schreiner）、安通·鲍尔（Antun Bauer）、沃伊切赫·格卢津斯基（Wojciech Gluziński）、瓦尔迪萨·露西娅（Waldisa Rússio）等。

1. 斯坦斯基与“博物馆物-博物馆性-博物馆化”^[11]

在捷克首次使用“博物馆学”这一词汇的是博物馆学家克莱门特·切尔马克（Kliment Cermák），他在1901年发表的《博物馆学教育》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为博物馆工作者提供专业教育的必要性。该思想也在亚尼切克（V. V. Jeníček）、阿尔宾·斯托克（Albín Stocký）等人的出版物中传承延续下来^[12]。在早期博物馆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捷克博物馆学家斯坦斯基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也是他将“科学博物馆学”的理论精进与深化，形成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

斯坦斯基认为，博物馆学的任务是“感知和识别在各个方面最能代表某种社会价值观的现实文献，因此在社会发展的利益下有权被选择、收藏和展示”^[13]。一言以蔽之，以斯坦斯基为代表的“科学博物馆学”学派认为：“博物馆学是研究人类与现实之间特定关系的学科。”^[14]多年后，布鲁诺·布鲁隆·索耶斯评论道：“首先有博物馆，然后有博物馆学。在中间，有（且仍然有）斯坦斯基的思维作为博物馆学学科结构的缺失要素。除了将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来捍卫之外，斯坦斯基的思想还将博物馆研究的重点从收藏和机构本身转移到了构成它们的过程上：即博物馆物、博物馆性和博物馆化。”^[15]

博物馆物被认为是“属于自然和物质文化领域的任何元素，被视为值得被保存的，无论是原地保存还是移出保存，或通过文件记录保存”^[16]。经过选择的博物馆物（现实元素）代表了文化价值（博物馆性），这是出于自身利益而保留的人类文化^[17]，但并不是每一次保留都会导致博物馆性的获得（例如，

存放在阁楼或地下室的物品)。与将现实转化为文化现实一样,将物品转化为文化遗产至关重要。博物馆不仅是保藏物品的地方,还是将普通事物转化为博物馆物的机构。博物馆物是因为重要性而被赋予博物馆性的物(斯坦斯基称之为博物馆性;克日什托夫·波米安^①称这些物为“*semiophores*”,即“承载意义”)。博物馆性可以与特定的博物价值相关联。因此,从感官-认知技能的角度来看,博物馆性作为信息源并且因其文化重要性而超越了时间价值。博物馆性是持久的,但并不意味着永恒,其指一切涉及博物馆性的观念、事物、设备及过程,博物馆学指包含广泛博物馆性的学科^[18]。博物馆化的过程有赖于积极有效的手段,而这便涉及斯坦斯基博物馆学理论中的三个方面:拣选(*selection*)、储藏(*thesaurization*)和传播(*communication*)。博物馆工作人员必须识别社会和自然发展中应该被记录、被展示的物件(拣选理论),对其进行保护以防止损毁(储藏理论),并使用适当的形式将它们呈现给公众(传播理论)。斯坦斯基提出的“博物馆化”,是理解社会进程的过程,也是超越机构的文化认知与批判分析的过程。在他的理念中,博物馆学不再仅局限于博物馆机构内,而是使博物馆成为博物馆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博物馆学应该是“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某一方面知识的途径,同时也是一种储藏记忆的手段”^{[13]33-39}。

2. 施莱纳与“博物馆物”

克劳斯·施莱纳强调对“物”的突出,尤其重视档案、记录等,他这样认识博物馆:“囊括整体特性、结构和发展的原则,决定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览,以及与这些实务沟通等的过程。他们长期介绍自然与社会发展,探讨知识,并传达这些知识及经验。”^[19]在关于博物馆学是什么,它研究什么的问题上,施莱纳曾这样写道:“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博物馆本身,不是博物馆物质,也不是

博物馆实物的价值,而是对博物馆实物进行收集、保存、解释和使用的规律。”^[20]从他的观点来说,藏品是博物馆的基础,但藏品研究并非着眼于“博物馆物质”本身,而是藏品收藏、保存的过程,既着眼于博物馆这一文化现象的物质,但又不囿于纯粹的收集、保存的原则方法等管理学问题^[21]。

同时,对物品的记录也是施莱纳关注的一个重点,他这样写道:“若无理性的记录,将无从得知博物馆物件许多关键性的信息内容,这些物件本身也没有表达力。博物馆物不能独立存在,只有当它们被找到和收藏、还能确定部分相关的周遭环境时,才有一定质及量的内容可为物件确定标准。”^[22]而在物件选择上,他认为博物馆的观赏性指的是直接唤起感官感受的实体或图片,包括原件或具有真实性的物件、图片聚合而成的收藏。可以看出,受民主德国的学术环境及传统的影响,施莱纳在博物馆学方面的研究有着一种拜物的情结,认为博物馆的物是“认识博物馆的决定性标准”,在关于藏品的收集、保存等方面有着不少的研究,博物馆中的物或者说藏品是他研究中绝对的“主角”。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便是施莱纳的《博物馆学基础》,该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博物馆学著作。他试图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博物馆现象,言简意赅,体系严整,在理论上有一定深度,具有德意志民族的思辨特点^[23]。例如他在书中所写的:“博物馆工作、思想、理论、方法、物质、体制和组织——简言之所有属于博物馆领域的现象——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且随着不同社会秩序的发展所呈现的特点和阶段而变化。”施莱纳将博物馆现象与社会阶级联系起来,梳理了许多历史上的博物馆现象的出现与背后原因:例如近代的博物馆工作是由市民阶级来承担的;古罗马作为奴隶制国家,需要相应的藏品和纪念物来巩固其经济与思想的统治等^[24]。这些例子都是从历史唯

① 克日什托夫·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是著名的波兰哲学家、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博物馆(Museum of Europe)的学术部主任。出生于一个有着左翼和人文主义传统的犹太家庭,他主要成名于历史哲学领域。

物主义出发,结合社会现状以及阶级的产生来进行阐述。

施莱纳将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来对待,他提及:“博物馆学是成长中的社会科学,在处理法律、原则、结构和方法的复杂过程中获取、保存、解码、研究和展示选择原始自然和社会的主要知识来源,创造了理论基础博物馆工作和博物馆系统的广义和系统的经验。”^[25]

他与斯坦斯基都认为博物馆学是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博物馆。斯坦斯基认为博物馆学的核心是人类的活动,博物馆学是关于“人和现实的具体关系”;施莱纳则是认为“博物馆学的特殊任务是精确地研究人与现实的具体关系”,施莱纳认为斯坦斯基的观点偏离了中立。同时他也对斯坦斯基所说的“博物馆性”进行了批判,认为斯坦斯基通过使用人类学的论据而忽略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接近态度使人怀疑”^[26]。

3. 鲍尔与“基于物的展示”

安通·鲍尔是南斯拉夫博物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是萨格勒布大学博物馆学研究生课程的创始人之一,他努力将博物馆转变为真正的公共机构,以满足当时新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教育需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对博物馆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化,通过增加博物馆的可及性和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展示收藏来使博物馆空间民主化。在创造更易理解的展览时,南斯拉夫的博物馆学家越来越多地提倡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处理和展示物质文化的主要方法论。如观众的体验需要反映现代博物馆的大众性质。鲍尔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是让观众感到他们是展示文化价值与珍品的“共有人和受益人”^[27]。这种共有的体验将使观众自然而然地树立正确的民族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因

为观众通过熟悉自己的文化历史,了解向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主义迈进的历史进程。

因此,通过鲍尔上述的主张与观点,他于1967年在萨格勒布大学博物馆学研究生课程中提出了“基于物的展示(object-based displays)”这一概念。在将博物馆学定义为一门“独立学科(用以)处理博物馆在社会中的概念化、组织和功能,以及社会角色和地位”之后,鲍尔借鉴了苏联博物馆学家费多·伊万诺维奇·施密特(Fedor Ivanovich Schmidt)^①提出的一个早期原则,即基于主题(subject-based)的展示方法和基于物(object-based)的展示方法。前者将任何给定的物视为具有其自身固有价值,该价值基于其稀有性、宏伟性、特殊性或艺术价值。这种方法不试图将物与任何更广泛的主题联系起来,因此仅仅作为对物的鉴赏,而不是对物及其背景或历史意义的解释。鲍尔将这种方法视为“保守博物馆学家”的资产,他们是稀有品的“库房管理员”,而不是社会文化教育的代理人^{[28]11-12}。而鲍尔认为,物质文化应该以物为中心的方法展出,其中物理材料被视为过去的文献,并成为引导观众理解某一主题或现象的手段。实际上,真实物件具有很少的固有意义,通常需要与其他材料一起展示,共同构成一个传达某种含义的“完整整体”。例如,一块石头提供了很少的信息,但当与其各种用途的照片一起展示,或者与由它制成的石器实物一起展示时,便可以提供一个直接的视觉链接,使人们了解它在人类历史中的位置^{[28]10}。

这种“基于物的展示”理念的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这表明这一理论模型确实进入了实际的博物馆空间。在一份1975年关于策划工人运动展览的报告中,布兰卡·米洛舍维奇(Branka Milošević)直接引用了鲍尔1967年的想法,并提出了如何落实这些理念。例如,她认为,那些倾向于

① 施密特是德裔俄罗斯人,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长时间研究拜占庭艺术。他于1919年发表《历史、民族学和艺术博物馆》(Historical, Ethnographic, and Art Museums)等有关博物馆学的文章,奠定了苏联博物馆学的基础。在1929年他撰写的《博物馆作品集》(Museums: Issue of Exposure)被认为是比肩西欧最优秀博物馆学家的作品。

数量胜过质量，并展示一系列没有任何审美标准物件的做法，成为了现代博物馆的“疾病”，最终破坏了它们的社会教育目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米洛舍维奇指导策展人大量依赖辅助文本和传说，将这些物件与展览的“主题整体”联系起来^[29]。米洛舍维奇解决这个问题的逻辑特别重要，将历史博物馆的关注点从物本身转向了它们所讲述的故事。

按照类似的理念，南斯拉夫的博物馆学家开始强调现代历史作为推动现代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社会目标的手段。作为博物馆学原则，现代历史包括两个彼此独立但密切相关的功能。从时间角度来看，现代历史意味着收集、处理和展示近期历史，即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人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事件，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战后经验。从主题角度来看，现代历史意味着通过马克思主义框架分析物质文化，以展示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了人类长期追求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巅峰。因此，博物馆专业人员主要以三种方式理解现代历史在博物馆工作中的功能：首先，作为叙述当时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国家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其次，为南斯拉夫新一代青年展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进步性和合法性；第三，通过展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事件和现象，如现代城市生活的发展和农村景观的变化，进一步与广大公众建立联系。

总之，基于物的展示，表现为强调意义而不是物本身，强调辅助材料，如传说、复制品、艺术再现等的重要作用。虽然这种形式本质上是出于意识形态考量并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但不应认为这纯粹是国家主导的宣传产物。相反，这一做法适应了国际博物馆学的大趋势，特别是在1968年博物馆危机^①之后的西欧，他们逐渐倾向于为普通观众创造更易理解和可及的博物馆空间^[30]。

三、研究实践：革命博物馆与本土博物馆

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博物馆学”的实践一直试图回答如何正确发展社会主义博物馆的问题：即如何将资产阶级历史博物馆转化为一个真正大众化的机构，使大众了解国家的文化遗产，理解他们在社会主义中的位置。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博物馆实践中的管理风格和解释方法产生了显著影响^[31]。

为此，博物馆专业人员开发了两种新的博物馆模式，即革命博物馆（Revolutionary Museum）^②和本土博物馆（Native Place Museum）^③。以南斯拉夫为例，革命博物馆负责讲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创立史诗，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以及战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本土博物馆同样通过展示地方历史和文化，加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国家认同，使其置于更宏阔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轨迹中^[32]。

1. 革命博物馆

革命博物馆首要关注的是收集、整理和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主义运动，即人民解放斗争的物质遗迹。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革命博物馆扩展了其关注范围，涵盖了当代历史的其他方面，如社会主义的建设、妇女参与战争的努力和现代社会中的妇女参与，以及与社会社会主义下的日常生活相关的主题。

在南斯拉夫所有革命博物馆中，常设展和临时展极大地依赖于书面文字、照片和复制品，同时只展示了少数精选的原始物件，且大多数以文本为基础，例如党的文件、传单或信件的原件等。正如巴比奇和杜尔贝希奇在1975年报告中解释的，这些博

① 此处的“博物馆危机”指的是在以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运动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和既定社会体系的反抗运动背景下，博物馆自身作为资产阶级与精英阶层的标志和象征而备受抨击，在要求社会深层改革的抗争中，博物馆的变革势在必行，而其存在意义需要多方面的反思。

② 此处的“革命博物馆”指的是20世纪50—80年代末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和阶级论观点为指导原则的红色主题博物馆。

③ 此处的“本土博物馆”又称“Homeland Museum”或“Local History Museum”，主要以展示地方历史、地理、文化等为主要内容。

物馆的教育目标是“记录和展示当代的发展是人民解放斗争的必然和逻辑延伸，是过去与现在的有机联系”。因此，它们不能在避免冲突和对抗的中立中运作，而是必须对历史和社会主义现状具有适当的阶级和意识形态解释，以及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方法^[33]。这一传统深受苏联博物馆学的影响，即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处理和展示物质文化的主要方法。为此，他们在博物馆传统的室内空间中插入大量的“教育性文本”，以便将物品框定为复杂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使其可被普通人理解^[34]，并试图发展一种能够促进国家团结并灌输社会主义价值的“新型社会主义环境”^[35]。

2. 本土博物馆

作为体现现代博物馆学的“综合型”博物馆，本土博物馆涉猎更广，涉及考古学、民族学以及地方和自然历史等各个领域。它们通常位于较小的乡村政府，且其首要目标是当地社区，其次是为游客提供服务。然而，本土博物馆同样被设想为体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将一切本地的事物，包括历史、地理、民族学材料，置于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

因此，革命博物馆和本土博物馆的基本逻辑根植于现代博物馆学的社会和教育目标，强调促进社区的参与、当代历史的重要性以及基于物的展示方法。这些博物馆还明确与历史上博物馆的不同，并与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地区居民积极互动^[36]。

四、内在延续性：趋向一种思想史

“科学博物馆学”通过学院教育和国际组织传播，并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鼎盛，同时也通过大学的学科训练和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如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委会（ICOFOM），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博物馆学学者，他们深受“科学博物馆学”的影响，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实践这一思想。

1. 学院式教育的延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博物馆学在大学中确立

其明确的地位，其中捷克斯洛伐克的马萨里克大学（Masaryk University）和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大学（University of Zagreb）成为博物馆学学院教育的典型代表和积极实践者。值得指出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博物馆学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大学中首次开设这一课程^[37]。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博物馆学文化中，被认为是战后创始人的两位人物分别是雅罗斯拉夫·赫尔费特（Jaroslav Helfert），他在1946年至1948年重新建立了布尔诺的博物馆学系；以及吉里·诺斯图普尼（Jiří Neustupný），他在布拉格的国家博物馆创立了博物馆学研究中心。在“布尔诺学派”的创始人中，影响最大的是扬·耶利内克和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坦斯基。耶利内克于1963年在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创建了博物馆学系，并于1964/65学年开始教学。他还于1971年至1977年担任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以及于1976年创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委会并担任主席。斯坦斯基在1986年又创立了布尔诺马萨里克大学的国际博物馆学暑期学校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国际声誉。该暑期学校拥有众多知名教师（包括伯纳德·德洛许、彼得·冯·门施、伊沃·马罗耶维奇、肯尼斯·赫德森、马丁·谢里等），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毕业生（如中国的安来顺、斯洛伐克的马塞尔·拉尔科维奇等）。自1996年以来，布尔诺的博物馆学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分支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物馆学和世界遗产教席的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博物馆学学院教育主要分三大体系，包括博物馆研究讲座、布尔诺的博物馆学教席以及布拉格的博物馆学教育中心^[38]。

而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的安通·鲍尔创立了南斯拉夫第一个博物馆学研究生课程（早在1946年就开始教授相关内容，1966年开设正式课程）和萨格勒布博物馆文献中心（1955年），并出版了南斯拉夫第一本博物馆学期刊（1953年）^[39]。在继鲍尔教授之后，伊沃·马罗耶维奇于1975年至1983年担任萨格勒布大学博物馆学研究生课程主任。萨格勒布大学的另一位杰出博物馆学家是汤米斯拉夫·索拉（Tomislav Šola），他从1981年至

1988年领导了萨格勒布博物馆文献中心，并自1995年起担任博物馆学研究生课程主任。

2. 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延续

“科学博物馆学”学派在定义研究方面的兴趣和倡导系统方法中扮演的创新角色（如斯坦斯基、诺斯图普尼、索夫卡），以及他们在相关专业组织机构中的参与（如耶利内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学的整体观点，特别是在欧洲大陆^[40]。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委会这一国际学术共同体在斯坦斯基等人的带领下，在《博物馆学百科全书》（*Dictionarium Museologicum*）的撰写和国际博物馆学暑期学校的培训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斯坦斯基、克拉西米尔·达米亚诺夫（Krasimir Damjanov）和索夫卡的组织管理下，国际博物馆学暑期学校（1987—1999）稳步发展，在国际专业领域获得了认可^[41]，同时，以斯坦斯基为代表的博物馆学思想得到了专委会内部成员的大力支持，进一步激发了例如克劳斯·施莱纳、阿夫拉姆·拉兹贡、安通·鲍尔和威廉·恩嫩巴赫、弗德利希·瓦达荷西、彼得·冯·门施和卡塔琳娜·弗吕格尔等学者的讨论，这些国际学者进一步地促进了“科学博物馆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传承。

五、余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17年，波兰学者米

切斯瓦夫·特雷特（Mieczysław Treter）在基辅出版了题为《当代博物馆学研究》的作品，他写道：“博物馆学不能成为目标本身——它们只是实现更高目标、理想目标的手段……”^[42]科学博物馆学已然跳出了博物馆机构，而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来进行哲学思考。美国博物馆学家博寇曾坦言：“东方的博物馆学更多地建立在哲学基础上，而不是实用主义基础上。我认为，从短期来看，西方的方法可能更具生产力，但从长远来看，东方的方法更为高效和有价值。”^[43]

科学博物馆学在探索博物馆作为社会现象和文化表现概念方面的角色，超越了与遗产相关的机构化，作为无形文化遗产，与当代知识、传播理论和信息社会中的跨文化对话相联系^[44]。正如克罗地亚博物馆学家索拉所指出的，将档案管理、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如博物馆实务）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传播和信息研究汇集在一起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45]。“科学博物馆学”的范式为这样的跨界与融合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料，而其形成的学术意识、学术理念、研究实践与内在延续性也印证了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所说的“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际”。

总之，“科学博物馆学”范式是博物馆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重要学术思想，无论其目前如何与其他博物馆学思想（如新博物馆学、批判博物馆学等）相互交叉融合，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其在学术史及理论研讨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必然促进未来博物馆学的思考与变革。

参考文献

- [1] DOLÁK J. *Museology and Its Theory*[M]. Brno: Technical Museum, 2022.
- [2] 葛兆光. 亚洲史的学术史: 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J]. 世界历史评论, 2021(2): 3-68+290.
- [3] 姜萌. 范式转移与继往开来: 中国史学史研究一百年[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2): 46-59+195.
- [4] MAIRESSE F. *Museology*[C]// *Dictionary of Muse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324-325.
- [5] SOFKA V. *Muséologie et Musées*[J]. *ICOFOM Studies Series*, 1987(12).
- [6] SOFKA V. *Museology—Systems, Systematics*[R]. Paris: ICOFOM consultative meeting, 1982.
- [7] MAROEVIĆ I. *Museology as a field of knowledge*[J]. *ICOFOM Studies Series*, 2000(8).
- [8] SOFKA V. The future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 Heritage and the environment[J]. *ICOFOM Study Series*, 1990(17): 9.
- [9] MAROEVIĆ I. Analyzing summary. In: *Object or document?* [J]. *ICOFOM Study Series*, 1994(23): 17-22.
- [10] NEUSTUPNÝ J. *Muzeum a věda*[M]. Praha: Národní muzeum, 1968.

- [11] 王思怡. 博物馆化: 科学博物馆学派斯坦斯基的学术理论与影响综述[J]. 博物馆管理, 2020(4): 34–44.
- [12] DOLÁK J. Czech and Slovak museology, current status and the future of this branch of science[J]. Nordisk Museologi, 2007(2): 99.
- [13] STRÁNSKÝ Z Z. Museology as a Science[J]. Museologia, 1980(15): 38.
- [14] STRÁNSKÝ Z Z. M úzejníctvo v relácii teórie a praxe[J]. Múzeum, 1970(3): 179.
- [15] SOARES B B. Provoking Museology: The Geminal Thinking of Zbyněk Z. Stránský[J]. Museologica Brunensia, 2016(2): 5–17.
- [16] MENSCH P V. Annual conference: muse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J]. ICOFOM Study Series, 1990(17): 13.
- [17] STRÁNSKÝ Z Z. Museology: Introduction in Studies[M]. Brno: Masaryk University, 1995: 28–29.
- [18] 弗德利希·瓦达荷西. 博物馆学: 德语系世界的观点(上)[M]. 曾于珍等, 译. 台北: 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 2005: 22.
- [19] SCHREINER K. Museologische Termini–Auswahl[M]. Eigenverlag: Neubrandenburg, 1982.
- [20] SCHREINER K. Fundamentals of Museology[M]. Waren, 1985: 65.
- [21] 熊建华. 博物馆学基本概念的几点思考[J]. 中国博物馆, 1988(4): 1–7.
- [22] SCHREINER K, WECKES H. Museologie–Gegenstand, Aufgaben, Bestandsbildung[M]// Studien zur Museologie. Berlin: Institut für Museumswesen, 1986: 99.
- [23] 冯承柏. 推荐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博物馆学专著——《博物馆学基础》[J]. 中国博物馆, 1987(2): 79–80.
- [24] 克劳斯·施莱纳. 博物馆领域的历史[J]. 王晖, 译. 中国博物馆, 1987(4): 66–80.
- [25] SCHREINER K. Common theses on museology: An attempt to summarize standpoints on the fundamentals of museology[J]. Museological News, 1985(8): 49–54.
- [26] WALZ M. Too early, too late: the relevance of Zbyněk Z. Stránský for German museology[J]. Museologica Brunensia, 2016(2): 44–50.
- [27] BAUER A. Neki Problemi Muzejske Arhitekture[J]. Muzeologija: Zbornik za Muzejsku Problematiku, 1953(3): 140.
- [28] BAUER A. Muzeologija: nastupno predavanje za kolegij Muzeologije na Postdiplomskom studiju, održano 13. VII. 1966. god[J]. Muzeologija: Zbornik za Muzejsku Problematiku. 1967(6): 6–21.
- [29] MILOŠEVIĆ B. Prezentacija Muzeja Radničkog Pokreta sa Osvrtom na Prezentaciju Socijalističke Izgradnje[J]. Muzeologija: Zbornik za Muzejsku Problematiku, 1975(17): 75.
- [30] MENSCH P V. Towards a Methodology of Museology[D]. Zagreb: University of Zagreb, 1992.
- [31] DOLÁK J. Museums in modern era[C]// Museums i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3, Brno, Technical Museum, Czech Republic, Brno: Masarykova University, 2004: 11–16.
- [32] PALHEGYI J. Revolutionary Curating, Curating the Revolution: Socialist Museology in Yugoslav Croatia[J]. Martor, 2018(23): 17–34.
- [33] BABIĆ K, DURBEŠIĆ V. Znanstveni zadaci u muzejima revolucije, odjelima narodnooslobodilačke borbe i socijalističke revolucije u kompleksnim muzejima [J]. Muzeologija: Zbornik za Muzejsku Problematiku, 1975(17): 52.
- [34] JOLLES A. Stalin's Talking Museums[J]. The Oxford Art Journal, 2005(3): 434.
- [35] VOJNOVIĆ Z. Naučno–Prosvjetni Zadaci Muzeja[J]. Muzeologija: Zbornik za Muzejsku Problematiku, 1953(1): 19.
- [36] ČALDAROVIĆ D P. History Museums in a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C]// Museums and Universal Heritage: History in the Area of Conflict between Interpretation and Manipulation. Luxembourg: ICMAH, 2008: 106.
- [37] GUBARENKO M. The influence of Z. Z. Stránský's idea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scientific school of the Department of Museology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Saint Petersburg State Institute of Culture[J]. Museologica Brunensia, 2016(2): 82–83.
- [38] KIRSCH O, JAGOŠOVÁ L. Towards professionalism through academic education in museum work: on the beginnings of museology education in Czech universities[J].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19(5): 487.
- [39] LORENTE J.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 studies in universities: from technical training to critical museology[J].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12(3): 237–252.
- [40] VIEREGG H K. Zbyněk Zbyslav Stránský, ICOFOM and the museology[J]. Museologica Brunensia, 2016(20): 76–81.
- [41] DOLÁK J. UNESCO Chair of Museology and World Heritage 1994–2002[J]. Muzeológia a kultúrne dedičstvo, 2016(1): 63–70.
- [42] STRÁNSKÝ Z Z. Archeologie a muzeologie[M]. Brno, 2005: 93.
- [43] BURCAW G E. Comments on MuWop no 1[J]. MuWop/Do Tram, 1981(2): 85–86.
- [44] SCHEINER T. Museum and museology: Changing roles or changing paradigms? [J]. ICOFOM Study Series, 2008(37): 81–89.
- [45] ŠOLA T. The concept and nature of museology[J]. Museum. 1987(1): 49.